

「五四」與臺灣新文學以及「朝鮮」 - 從《臺灣民報》兩篇小說談起

〔臺〕崔末順*

目次

- 一、1920年代臺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接點
- 二、〈臺娘悲史〉中的殖民地現實與歷史認知
- 三、〈牧羊哀話〉的刊登意圖與東亞現代認識場
- 四、臺灣「五四」文學發展的侷限及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一、1920年代臺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的接點

一般都認為1920年代為臺灣走進現代歷史階段的起點，此時臺灣雖已淪為日本殖民地，在自主發展上受到限制，但因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交通通訊網等的建立，而成為單一政治經濟共同體，並隨著新興知識階層的出現，以及拜他們所推動的文化啟蒙運動所賜，現代文學也開始起步發展。早期渡日尋求教育機會的知識分子，陸續成立了「聲應會」、「啟發會」(1919)、「新民會」(1920)等團體，並透過《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現代媒體，開始展開兼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具要求政治改善和文化啓蒙的新文化運動。

1920年代初期，知識階層投入運動的契機，可從《臺灣青年》創刊號(1920.7.16)中看出：「是空前而且或許是絕後的世界大戰亂，已成了過去的歷史。幾千萬的生靈，爲此流了鮮血，而化爲枯骨了。呵!慘絕!悽絕!!人類的不幸，難道有甚於此的麼?有著這個絕對的大不幸，死不完的全人類，已從既往的惰眠醒了。厭惡黑暗而仰慕光明—這樣的醒了。反抗橫暴而從正義—這樣的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獨尊的之野獸生活，而謀共存的、犧牲的、互讓的之文化運動—是這樣的醒來的了。」¹⁾他們認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當時國際聯盟甫告成立，民族自決理念逐漸受到世人關注，男女同權和勞資協調的主張也被提出，他們認爲人類自此將進入抗拒橫暴、推崇正義的大覺醒時代，因而大聲呼籲臺灣青年要趁此良機勇敢奮起，邁向愛好和平、自新自強之路。雜誌成員意見大都一致，李漢如(1877-1936)提到：「招致無數人命和財產的歐洲大戰已結束，代表著軍國主義時代已過去，而經濟主義也即民生主義的時代到來，因此爲實現民生主義，無論知識的有無、身分和階級的不同，所有人都要受同等的教育，享有同等的自由。不過目前臺灣人民因愚民政策和六三特別法之下得不到如此權利，所以透過發刊雜誌傳達知識，提供給臺灣人民自覺的機會。」²⁾；林慈舟(林呈祿，1886-1968)也說：「甫結束四多年世界大戰慘劇，我們正面臨著討論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國際聯盟、勞働階級之解放和民族自決之運動，如此世界革新的時代，臺灣的青年應抖擻精神，憤然猛省，專心毅力，考究文明之學識。」³⁾王敏川(1889-1942)也強調：「今日世界改造之秋，國民之榮辱，不在乎國力之強弱，而在乎文化強度之高低」，不過，「吾臺學校教育未普及，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又不完備，文化愈趨愈下」，因此「爲了文明的啓發和高尚文化的吸收，創刊《臺灣青年》而盡臺灣文化之促進的責任和使命。」⁴⁾此外，蔡培火

1) 〈卷頭辭〉，重載於《臺灣民報》67號，1925.8.26，頁36。

2) 〈發刊之辭〉，《臺灣青年》創刊號，1920.7.16，頁7-9。

3) 〈敬告吾鄉青年〉，頁36-37。

4) 〈『臺灣青年』發刊的趣旨〉，頁40-41。

(1889-1983)和蔡鐵生(蔡惠如, 1881-1929)也認為世界大戰之後的情勢已從弱肉強食的時代轉移為和平文化的時代, 決心透過振作文化引導臺灣人民走向自覺的狀態。⁵⁾這些推動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一致認為, 歐戰後新的歷史階段即將到來, 各民族和個人都會得到自由平等和解放的保障, 循此氣運, 必然要用文化手段開啓新的時代。

雜誌改名為《臺灣》之後, 為順利推動文化和政治運動, 不僅刊登科普知識和世界情勢等現代性論述, 同時也大量載錄臺灣自治和地方自治論、同化主義和六三法問題、保甲制度和臺灣議會設立的檢討等政治議題文章。此外, 還透過刊載對中國表示友好態度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的言論文, 間接強調固有民族性的同時, 也提出批判日本的民族論述。⁶⁾

新文化運動的啓蒙內容和政治要求, 至1923年《臺灣民報》創刊後, 更形具體化。由旬刊形式出發的民報, 廢除了前二本雜誌階段採用和漢文混用的標記方式, 改為純漢文雜誌來自我定位⁷⁾, 甚至還更進一步使用平易的白話文, 展現出啓蒙大眾的強烈意圖。民報為1921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的機關誌, 號稱「臺灣唯一之言論機關」⁸⁾, 其發行量超過一萬部以上, 於日本、臺灣和中國各地都有流通, 可說是一本具有影響力的現代媒體, 因此辦報成員普遍都對其所扮演啓蒙大眾和傳輸政治和民族意識的角色, 感到自豪。民報的核心人士慈舟在〈創刊詞〉說:「歐洲戰後, 思潮大變, 世界上人人都曉得求自由平等, 唱人道正義, 我們島內同胞, 若沈醉不醒, 深迷不悟, 也恐怕將無顏可以見世界上的文明人了。」⁹⁾再度點出一戰後的世界變化局勢, 並強調為了謀求臺灣人的平等和生存權利, 必須透過言論機構來對社會進行教育, 以喚醒民心, 可見基本上仍然奠基在《臺灣青年》的時代認知上, 持續推動新文化運動。觀其啓蒙

5) 〈對內根本問題的一端〉, 頁46-53。; 〈我之所望於青年〉, 頁53-54。

6) 例如, 有〈中國國民性的幾個特點〉, 《臺灣》3:1, 1922, 4, 頁24-34; 〈中國文明與西洋〉, 《臺灣》3:6, 1922.9, 頁1-9)等文章, 《臺灣民報》也持續刊登此類文章。

7) 由於1923年發生關東大地震, 《臺灣》雜誌一時中斷, 其後《臺灣民報》8號(1923.10.15)到14號(1923.12.21)期間會短暫復活和文之部。

8) 1925年07月12日改制為週刊(60號)時開始使用此一文句。

9) 《臺灣民報》創刊號, 1923.4.15, 頁1。

內容，可分為兩類：一為持續傳播文明和知識的現代論述；二為批判殖民政策，要求政治改善的呼訴。前者屬於文化運動範疇，後者則屬於政治運動性格。

如此，屬於文化運動範疇的臺灣新文學，即是在文字改革和現實反映的要求聲中成立，其發展方向在民報中也明確指向中國白話文的現代文學。¹⁰⁾民報如此的思考和作法，顯然著眼於復興漢學(文)和啓蒙便利之故。蔡鐵生說：「因臺灣當局政策在學堂裡不肯教學生的漢文，漢文種子幾乎被斷絕的地步，因此數千年來的固有文化也自然無從研究，我們民族觀念都快被消滅，要補漢文的一線生機來保存我們的固有文化，振興我們漢民族的觀念。」¹¹⁾；慈舟更明白道出：「這回新刊本報，專用平易的漢文，滿載民衆的智識，宗旨不外啓發我島的文化，振起同胞的元氣，以謀臺灣的幸福，求東洋的和平而已。」¹²⁾闡述復興漢文的目的是在於鼓吹民族意識，¹³⁾而使用白話文的用意則在於方便啓蒙民衆，臺灣現代文學與192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兩個屬性—文化啓蒙和政治要求之間的影響關係，由此確定。也就是說，臺灣現代文學是在推動漢文現代化改革用以鼓吹民族意識並要求改善殖民地政治處境的新文化運動中成立，《臺灣民報》不僅提供醞釀現代文學的園地，也確立了此現代文學發展的基本方向。

瀏覽1920年代前半期的民報內容，不難發現破除不平等現實和提出政治要求為當時主要訴求重點，例如：大幅報導治警事件的公審過程和審判結果，包括被連累人士的公開陳述和入獄日記¹⁴⁾；師範學校罷課經過及後續處理問題，如

10) 有關語言改革和白話文主張，雖在《臺灣青年》和《臺灣》階段也出現過，不過以中國新文學作為學習對象的明確主張，則是在《臺灣民報》階段時才被正式提出。

11) 〈祝臺灣民報創刊〉，《臺灣民報》創刊號，1923.4.15，頁2。1922年「台灣教育令」發佈公學校漢文課改為隨意課，各地方以實際需要自行廢除漢文課後，要求恢復漢文課的輿論沸騰。不僅如此，當時日本衆議院通過了漢學振興建議案，讓民報更有強調漢字和漢學教育重要性的說服力，民報上甚至有報導女子漢學研究會成立的消息。有關漢文復興運動，參考王順隆，〈日治時期台灣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臺灣風物》49卷4期（1999.12），頁107-127。

12) 〈創刊詞〉，《臺灣民報》創刊號，1923.4.15，頁1。

13) 「消滅漢文」是日閣據台政策，漢文雖在公學校被列為隨意科，但是教與不教的權限，完全委由地方公學校長裁量，但各地方的公學校長卻千篇一律都把漢文看作無關輕重的學科。

學生立場和被退學學生的留日就讀情況；二林蔗農和林杞埔竹林事件等。不僅如此，報導還進一步提出改善方案，如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消息及教育情況、警察統治、言論自由等殖民政策問題。¹⁴⁾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兼具包含文字和文學改造在內的廣泛文化運動，以及主張政治性要求的民族運動性格，他們開始如此企劃並付諸行動，乃受到一戰後世界情勢變化以及期待文化世紀到臨的影響。

把1919年前後視為人類進入新歷史階段的，不僅只是臺灣的知識分子，中國新文化運動重鎮《新青年》的激進派知識分子李大釗(1889-1927)也說：「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的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那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¹⁶⁾對於一戰的終結，他賦予了庶民勝利和打倒軍國主義的深層意義。陳獨秀(1879-1942)也在迎接1919年元旦時，提出此一時刻乃人類生活的新紀元，它與1914年之前的生活、文明和世界大為不同，肯定會帶來新生活、新文明和新世界的說法。¹⁷⁾這些《新青年》成員從上海遷移到北京，並發行《每週評論》刊物，加上陳獨秀、李大釗、胡適(1891-1962)的弟子傅斯年(1896-1950)、羅家倫(1897-1969)、顧頡剛(1893-1980)等北京大學學生在1919年1月創辦《新潮》月刊，由此而形成了由五四知識分子階層正式推動的全面性的文化運動。就在此時，傳來巴黎講和會議的山東決議案21個條消息，更激發了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操，很快的這股熱潮擴散至全國，成為廣泛領域的五四運動。

其中包括文學改革的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前，1915年已有人提出反省

14) 30號(1924.9.1)為「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治安警察法違反嫌疑事件第一審公判」特別號。

15) 民報還安排〈風順耳〉和〈不平鳴〉欄位，蒐集法律制度上的不公平案件以及日本警察的橫暴事例，廣泛披露臺灣人民的心聲。

16) 〈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庶民的勝利〉，《新青年》5：5，1918.10。

17) 隻眼，〈新紀元〉，《每週評論》第2期，1918.12.29。

傳統、接受西方文明，帶有思想改造性格的倡議。至於改革文學的主張，肇始自胡適於1917年1月在《新青年》期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其後胡適又發表另一篇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包括文學形式和內容的革新，即著名的「八不主義」，被視為文學革命的宣言。緊接著在陳獨秀、錢玄同(1887-1939)、劉半農(1891-1934)、周作人(1885-1967)等人的響應下，文學改革運動的推行，大步向前邁進。繼而在發展成全國性的五四運動的鼓舞下，白話文逐漸普及，而最初的新詩九首包括胡適的四首、沈尹默(1883-1971)的三首、劉半農的兩首和最初的新小說魯迅(1881-1936)的〈狂人日記〉¹⁸⁾，分別刊在《新青年》1918年1月及5月號，文學改革運動乃告一段落。¹⁹⁾

不過，此一時期的文學改革運動，並非單純的文學運動，應該說它是在整體社會改革大環境下所產生的新文化運動或新思想運動的一部分，此乃因這時期的文學改革運動，總的來說，是自鴉片戰爭失敗、太平天國起義、英法聯軍攻占津京、甲午戰敗、義和團事變、辛亥革命，以至巴黎和會引發五四運動等等內憂外患的環境下所醞釀形成。五四代表作家魯迅的〈阿Q正傳〉即是一個典型例子，這部作品批判病態的國民劣根性，痛罵中國人的不覺醒，認為要讓卑躬屈膝、愚昧無知的國人醒悟，相較於形式性的政治運動，精神和文化的革命才是正途，可見五四文學作為文化運動的性格，相當明顯。陳獨秀也明白表示，希望新文化能夠影響到政治方面，創造出理想的局面。²⁰⁾

如此兼具文化和政治運動雙軌並行的五四性格和精神，與1920年代初臺灣知識階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其基本內容並無二致。他們都是建立在一戰後世界情勢變化和新文化時代的共同認知上，冀望透過文化普及來改善民族處境為其最大目標。可以說中國和臺灣的知識階層面對歐洲大戰帶來的全球效應，都以

18) 被視為中國新小說第一篇作品的，有陳衡哲〈一日〉和魯迅〈狂人日記〉，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參見尹雪曼，《中國新文學史論》(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1983)，頁325。

19) 參考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臺北：古楓出版社，1986)，頁73-74。

20) 陳獨秀在〈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每週評論》第14期，1919.3.23)中說到：「我們希望朝鮮人的自由思想，從此繼續發展。我們相信朝鮮民族獨立自治的光榮，不久就可以發現。」

明確的方法和目標，為自己的社會和歷史找尋方向，進入所謂真正的東亞現代階段。無論成功與否，他們深信以實際行動，付出努力，即可贏得民衆的勝利，邁入人類的新紀元。由此可知，1920年代初期臺灣新文化運動與「五四」在此即產生了接點。²¹⁾雖然因當時兩地的歷史條件不同，其文化運動的內容和推進過程上也有所差異，²²⁾但是透過文化和精神改造達成政治目的的途徑，卻是一致。加上，中國早一步從1915年《新青年》開啓的文學改革訴求，早已成為推動臺灣新文學的參考和學習對象，特別是1923年民報在發行之時，明確提出為鼓吹民族意識而復興漢學，為便利啓蒙民衆將採用平易的白話文，足以說明中國白話文運動的主張及其理論乃至五四新文學作品，透過民報的引介和轉載，始終深深地影響著臺灣現代文學的理論建構和文學創作。

本文在上述1919年前後臺灣和中國的歷史狀況，以及兩地知識分子的時代認知基礎上，探索中國五四運動和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接點，並在此過程中進一步考察韓國的三一運動如何帶給中國知識分子思想上的衝擊，又受此影響的五四精神和文學如何在臺灣新文學運動中被看見。本文主要選出《臺灣民報》所刊兩篇小說—施文杞的〈臺娘悲史〉和郭沫若的〈牧羊哀話〉，據以討論新文學和五四文學所關注的議題，以及朝鮮作為媒介呈現出的時代歷史認知，進而探討早期知識階層如何把握中國—朝鮮—臺灣的聯動關係所形成的東亞現代認識場。

二、〈臺娘悲史〉中的殖民地現實與歷史認知

作為新文化運動一環的臺灣現代文學，透過《臺灣民報》系列報紙與雜誌的發行，鳴笛啓航。被稱為新文學代表作家賴和(1894-1943)的新詩和現代小說，

21) 陳獨秀的〈敬告青年〉也轉載在民報第1卷第7號(1923.9.1.)，該文原載於《青年雜誌》1卷1號(1915.9.15)，《青年雜誌》後改名為《新青年》。

22) 該時期兩岸現代文學理論上的差異，參考崔未順，〈新文學的啓蒙內容及其結構：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文學論比較〉，《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研究》(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2017)，頁097-132。

以及同時期活動的楊雲萍(1906-2000)、張我軍(1902-1955)、楊守愚(1905-1959)等人的作品，都是透過民報先後問世。不過，在臺灣作家正式登壇以前，民報刊載的現代文學，主要來自胡適到魯迅、冰心(1900-1999)、郭沫若(1892-1978)、落華生(許地山，1894-1941)、徐志摩(1897-1931)、張資平(1893-1959)、倪貽德(1901-1970)等五四文人的作品以及他們的譯作。這些刊登在民報的五四文人之作，大致上都符合民報的基調－文明開化主張和民族處境的批判性認知：例如較為早期轉載的胡適譯作〈最後一課〉²³⁾、〈二漁夫〉²⁴⁾、郭沫若的〈牧羊哀話〉²⁵⁾等小說，都具有鼓吹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的主題意識²⁶⁾；胡適劇本〈終身大事〉(1：1-2)和〈李超傳〉(1：4)、夫庵的〈一個貞烈的女孩子〉(3：18)、魯迅的〈狂人日記〉(3：15-16)等作品的主題，都涉及到打破封建禮教和迷信及啓蒙新思想；魯迅的〈阿Q正傳〉(81-91號)和〈犧牲謨〉(84號)等作品，則是對中國民族性進行強烈的批判和控訴。

這些民報所刊載的五四文學作品，不僅內容上合乎文化啓蒙和鼓吹民族意識的宗旨，作為白話文創作的示範，也符合民報的漢文改革意圖。²⁷⁾當然，中國白話文運動推動的經過和相關內容，主要是藉著留中學生和旅中知識分子，引介至臺灣。²⁸⁾當中，扮演最為關鍵角色的人物，當屬張我軍(1902-1955)。1924年他從北京回臺擔任民報編輯，發表一連串文章，如〈文學革命運動以來〉(3：

23) 1：3(1923.5.15.)，法國小說家阿爾豐斯·都德於1873年發表的一篇名作，現代初期東亞各國都有翻譯本問世，如日本(1902)、中國(1912)、韓國(1923)等。胡適的中文譯本，1912年11月5日刊登在上海《大共和日報》，最初譯名為〈割地〉。

24) 2：3(1924.2.21)，原作為法國小說家莫泊桑的小說。

25) 見本文第三節。

26) 〈最後一課〉附帶說明原作者和小說背景後提到：「此篇托為阿色司省一小學生之語氣，寫割地之慘，以激湯(盪)法人愛國之心」，當時殖民當局採用消滅漢文政策，以致讓人有漢學將遭到消滅之憂，因此刊登該作意圖明顯，蔣渭水也在讀後深表同病相憐之感，因而一再推介給大家。

27) 創刊號就披露創設白話文研究會的消息，以及讀者詢問白話文研究的相關問題，其積極推動白話文的作為，相當明顯。

28) 如在《臺灣》發表〈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的黃呈聰、發表〈漢文改革論〉的黃朝琴，以及在民報上強力主張新文學的張我軍等人，都有此背景和經歷。

7-9)、〈詩體的解放〉(3:7-9)、〈新文學運動的意義〉(67號)等直接移植自中國白話文運動的理論和文學主張，並主導轉載〈阿Q正傳〉、〈狂人日記〉、〈故鄉〉(3:10-11)等魯迅的代表作，從此五四文學與臺灣新文學正式產生接點，五四對臺灣現代文學的形成和發展，也帶來莫大的影響。

不過，在張我軍全面引進中國文學革命運動相關文章之前，民報已經刊登過主張使用白話文的文章以及白話文創作，例如施文祀的新詩和楊雲萍的小說即是。其中，施文祀發表過詩作多首，號稱是臺灣新詩的開拓者，²⁹⁾有關施文祀的生平事跡，並無詳細記錄，只知道他是彰化鹿港人，曾赴日留學，1922年到菲律賓，1923年到中國上海就讀南方大學。³⁰⁾他投稿民報期間，還在上海南方大學求學，可以推斷五四以前他已對該地發行的《新青年》和中國文學革命運動有所認識，對中國白話文的使用情形和普及狀況也非常清楚。事實上，他在民報第2卷第4號(1924.3.11.)，還曾發表〈對於臺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臺灣人的研究白話文者注意—臺灣人的投民報者注意〉一文，拿民報所刊載文章為例，提出白話文的誤用情形。施文祀在上海念書期間，曾參加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策進臺灣民族運動作為目標的「上海臺灣青年會」(1923)，並對臺灣議會設置運動極表支持，與中國國民黨亦有聯絡，還參加過上海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³¹⁾可見他的思想與民報的趣旨相當一致。³²⁾

施文祀在民報第2卷第2期(1924.1.1.)發表的小說〈臺娘悲史〉，算是相當早期的臺灣現代小說，使用流暢的白話文探討臺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過程，以及在殖民政策壓迫下臺灣人的處境。1926年賴和登壇之前的小說，通常被認為具有過渡期特色，³³⁾例如〈她往何處去〉、〈神秘的自制島〉、〈犬羊

29) 中文詩〈送林耕餘君隨江校長渡南洋〉發表於1923年12月1日出刊的《臺灣民報》1:12。

30) 按照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中華會館之研究〉一文，1926年左右北京僑務局派遣特派員施文祀來台調查僑務，第二年他撰寫「台灣漫遊記略—華僑狀況的報告」，刊登在『台灣日日新報』朝刊，第九六四五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市政府：1990)，頁31-68。不過是否為同一人，仍然無法確認。

31) 陳三井，《國民革命與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1980，頁42。

32) 施文祀發表在民報的〈斐律濱三十年來之趨勢〉(2:1, 1924.1.1, 頁4)，文章中有提到係東京民報同志的邀稿。

禍〉、〈最後的解決如何〉、〈臺娘悲史〉、〈家庭怨〉、〈黃鶯〉等小說，在形式上展現出來的是從古典轉型到現代小說的過渡形態；但在內容方面卻明白地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文明開化和現實批判。

〈臺娘悲史〉演示的內容為貧窮的華大女兒臺娘，被經營雜貨店並且充滿野心的日猛以詐欺和計略所騙，以致變成他的小妾的故事。這篇小說採用擬人化手法，透過分別代表中國、臺灣、日本的華大、臺娘和日猛的人物描寫，呈現臺灣淪為殖民地過程的歷史記憶和看法。小說無論是人物的性格或經歷，都有深刻而立體的描寫，透露出作者所要表達的歷史認知。象徵中國的華大「本來是一個忠厚和平的人，是極不願意輕和人家交惡的」，因為現在是「赤貧的無產階級者，日常費用，入不敷出弄得經濟窘迫、困苦萬狀。」而象徵日本的日猛「本來是華大雇的夥友，後來因自己有積儲些錢，就自己地去開張一間店鋪，專營業雜貨的生意。開張之後，幸運兒運好，營業日見興隆。所賺之錢，必是不少了，所以日猛就將生意擴張起來，而自己要做一个實實在在地大資本家了。從前是做人家的夥友，現在一躍而做個富家翁。小人得志，傲慢自高，那賢婢蓄妾，異想天開，自然是脫不離他的思想了。所以見著臺娘這樣的美貌，這樣的才藝，那裡不垂涎三尺，異生（覬覦）之心！」日猛得到臺娘為妾，「終日把臺娘看做是一塊安樂土了。日惟教她裝束嬌態，以取自己地快樂，卻不願意教她去研究些學問，以為將來立足社會的地位。」這種條件下，臺娘非常悲傷，「在深閨裡暗暗地自酒」，後來聽到「各地高唱女權伸張」的聲音，「男女社交公開」、「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女子參政運動」、「自由戀愛」等新思想，要求日猛「還我自由」、「尊重公理」，「但日猛本來是只挾著『強權』，那知『公理』是什麼東西？不單是不肯表同情，卻是反抱忌妒之心，更加嚴束，以防臺娘有生異志。臺娘如有稍不順他的意思，便被吐罵鞭撻無所不為。人格尊重，絕不稍留餘地。」小說如此描寫中國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以及臺灣的處境，可見作者想要批判的是日本侵略的不

33) 陳芳明在《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經，2011)第三章以文字和情節的圓熟度為基準，將賴和小說以前的五篇小說，視為實驗階段。

當性和臺灣所處的險惡環境。

民報刊載〈臺娘悲史〉的核心功能在於時事性的主張，小說內容上呈現出對殖民統治的強烈批判和反抗的情緒，具有否定現實的認知和批判歷史的視角，同時也強調民族對現實處境應當要有自覺心。此外，作品還透過臺娘的聲音，主張個人主體性、人性的解放等比較普遍性的現代價值。這些可說就是在當時新文化運動文學理論的建構中，所強調的社會革新、社會任務的具體實踐，展現出作者堅持建構臺灣社會現代化的信念，以及想要擺脫殖民地臺灣枷鎖的欲望。

小說在臺娘變成小妾的過程中，提到「日猛見華大忠厚和平的樣子，便以為更加可欺負，就集些無賴流氓，藉爭高麗蔘的緣故，來做交涉問題，種種武力示威，惹起惡感。」而華大終究鬥不過日猛的無理取鬧，只得與他商議和平條件：「第一條、就是要求臺娘為妾；第二條、就是要求華大的媳婦滿姐今後所生的兒女要去給他；第三條、要求賠償這次的損失」，如此商議的條件，實際上卻是暗指甲午戰爭的發端原因，以及戰後締結的馬關條約內容。1894年朝鮮王朝發生東學黨事件，清朝應朝鮮所請，派兵進入朝鮮半島，並依照中日天津條約，將該等行動知會日本。事件平息後，日軍拒絕撤兵，還突襲駐守朝鮮的清軍，清廷只好被迫向日本宣戰，由此而爆發了甲午戰爭。其後清軍戰敗，清廷向日本求和，締結馬關條約，主要內容為向日本永久割讓臺灣、澎湖群島與臺澎附屬各島嶼，以及北緯41度線以南的遼東半島。1895年4月17日議和談判期間，雙方經過數次會面談判及書面協調後，日方降低要求，將賠款縮減為庫平銀二億兩白銀；縮減遼東半島割讓範圍；減去順天、湘潭、梧州三處通商口岸。小說中日猛開出的條件正是符合馬關條約的內容，作者非常清楚甲午戰爭係因中日兩國為爭奪在朝鮮的利益而爆發，其結果臺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小說也藉此對日本佔據臺灣之後的種種嚴厲政策，提出辛辣的批判。

如此，從〈臺娘悲史〉的內容和視角當中，可看出1920年代初期臺灣知識分子的歷史認知，他們明確把握當時中國、日本、臺灣和朝鮮的連動關係，並在清楚此地區局勢的基礎上，揭露殖民地臺灣的現實困境，進而試圖摸索其改善

方案。由此可知，1920年代初期在五四文學磁場下的臺灣現代文學，兼具文化啓蒙和政治要求的共同特性，同時對連動的東亞情勢也有一定程度的認知。

三、〈牧羊哀話〉的刊登意圖與東亞現代認識場

考察《臺灣民報》刊登的中國新文學，1925年以前，要以胡適作品居多，之後則集中轉載包括魯迅在內的多位五四文人作品。郭沫若的短篇小說〈牧羊哀話〉也是從1925年10月到11月(76-78號)共三回連載於民報上。該作被認為係作者的處女作，³⁴⁾創作於1919年，³⁵⁾發表於《新中國》雜誌第七號上(1919.11.15)。³⁶⁾如果說在五四文學中，〈狂人日記〉為新文學第一篇反對封建禮教的檄文，那麼〈牧羊哀話〉就是第一篇聲討帝國主義的小說。³⁷⁾

郭沫若為五四的代表性作家，在日本九州大學醫學部就讀時，與郁達夫(1896-1945)一起組織了中國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文學社團「創造社」，而在文學史上一般認為他的新詩成就要高於小說。包括〈牧羊哀話〉在內，郭沫若的作品在1925年集中刊登在民報上，如新詩〈仰望〉、〈江灣即景〉、〈贈友〉(3:16)、〈夕暮〉(84號)，都是在張我軍的主導下轉載刊出。該作在連載結束時，張我軍寫了一篇附記，提到：「郭沫若先生的小說也有不少佳作，但我最愛這篇，所以轉載出來，請大家來同賞鑒。」³⁸⁾

34) 郭沫若提到自己最初的一篇創作叫做〈骷髏〉，投寄到東方雜誌沒被刊登寄還到自己手上，因此把它火葬了。

35) 1985年人民大學出版社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九卷〈牧羊哀話〉後記中，作者親自提到創作於1918年2,3月間，不過，作者在《創造十年》中卻說，〈牧羊哀話〉是「在巴黎正開著分贓的和平會議，同時『山東問題』也鬧得甚囂塵上來」的時候寫的，據此可以認定這篇小說實際上是寫於1919年的2,3月間。

36) 第一次刊載後，三聯出版社也出版了同名小說集《牧羊哀話》。之後又以作家自選集、作家文集、作家全集等形態方式多次刊行，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以兒童為讀者對象，出版連環畫形式的改寫作品。

37) 《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3期，上海文藝出版社，1963，頁35。

38) 《臺灣民報》78號，1925.11.08，頁15。

〈牧羊哀話〉是一篇以朝鮮作為背景的小說，這應該跟作者的日本留學經驗有關。郭沫若在1914年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就讀，一年半後轉到岡山第六高校，1918年夏天高校畢業考入九州帝國大學時，開始創作文學。赴日求學可說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國，他並非直接從上海前往福岡，而是在北京搭乘京奉線，經由山海關、奉天、安東，進入朝鮮半島，1913年12月31日抵達釜山，在中國館待了幾天後，於1914年1月13日搭船前往東京。如此過境朝鮮走陸路的旅程，給他帶來不少寫作靈感，把第一篇創作的背景設定為朝鮮，即是緣自於此。他在《創造十年》裡說出了「由北京乘京奉鐵路渡日本時，途中經過朝鮮的一段經驗，便借朝鮮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鮮人的心裡」³⁹⁾的心理背景。

小說採用框架結構，話者「我」來到朝鮮金剛山下一個小村落，待了一些時日，期間聽到「我」所遇見的牧羊少女的故事，小說情節就是以紀錄這個故事的方式展開。小說開頭部分提到「金剛山一萬二千峰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朝鮮之後，住在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裡面。村名叫做仙蒼里。」接著說：「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出。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原，只這村之近傍，有數畝農田，幾行桑柘。菜花麥莠，把那農田數畝，早鋪成金碧迷離。那東南邊松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如此明確交待了地名及附近的地理環境。實際上，金剛山一帶確實有條仙蒼溪，或許溪邊就有一個叫仙蒼里的村落，此外，也有赤壁江，指的是金剛山三日浦一帶的南江(全長85.5公里)，南江下游因經過名勝赤壁山而名為赤壁江。赤壁江發源於位在江原道高城郡和金剛郡邊界的遮日峰，經由高城郡舊邑里流入大海。對照此一實際環境，可以推估小說空間背景為目前北韓境內江原道高城郡舊邑里的海邊村落。另外，小說提到「我」借住的房子後面就是九仙峰，此為金剛山位於面向東海的最後山峰，因此可以確定小說中所提到的地理背景，與實際地理幾近吻合。

39) 郭沫若，《創造十年》(上海：現代書局，1932)，頁70。

故事結構和登場人物算是相當複雜，除了話者「我」以外，還有六個人物出場：閔崇華為朝鮮王朝的子爵，他聽到韓日合邦消息後屢次書寫奏本上疏，提請朝廷除倭安邦，但都未被接受。因此他研判大勢已去，無法挽回，於是放棄官職，攜帶一門上下，從京城遷徙到此村落來；他的女兒佩萸是個牧羊少女，每天唱著悲傷的歌，思念尹子英；尹子英為閔家奴僕尹石虎的兒子，是一位英俊青年，閔崇華對他信任有加、疼愛不已，並託他照顧閔佩萸，也將民族的希望寄託於他；此外，還有子英的母親尹媽和父親尹石虎，以及閔崇華的繼室李氏。遊覽金剛山度日的「我」，有一天偶然看到唱著哀傷曲調的牧羊女郎，一時好奇向房東尹媽問起女郎的身世。結果意外聽到原是貴族出身的閔佩萸落難為牧羊少女的原委，以及發生在她周遭人身上的悲劇：來到金剛山下小村落隱居的閔崇華一家，住房緊挨著靜安寺，他們遠離浮華塵世，過著與世隔絕的清淨日子。尹石虎一家在傍服侍他們，子英比佩萸大一歲，他們之間萌生了濃濃情意，每天一起念書、一起上山放羊。閔崇華的繼室李氏係名門出身，曾留學日本，旅遊過倫敦、巴黎、維也納等歐洲大城，二十二歲回國時與喪妻三年的閔崇華結婚，但未育有子女。作為新女性的她，居住京城時，曾是活躍於社交界的交際花，受到名門貴族的注目。如此一度過著奢華生活的李氏，無法長期忍受山中淡泊清苦的日子，於是暗通日本人，收買尹石虎，計劃揭發閔崇華的反日詩文，打算除掉自己先生，以便重回京城。尹子英知道父親被牽連在內的陰謀之後，為了營救閔崇華和佩萸，留下一封揭發真相的信給母親，即假扮閔子爵，故意被父親所殺。真相大白後，尹石虎痛苦不堪，旋即遠走他鄉，不知去向，李氏也自盡，留下的只是尹媽和佩萸無限的傷痛與惆悵。後來，閔子爵落髮出家，佩萸親自牧羊，看管子英的羊群。子英死後，羊群不肯進食，幾年之內死了大半，佩萸堆了一座羊塚，讓牠們陪伴九泉之下的子英。⁴⁰

聽完尹媽講完上述故事後，「我」作了個惡夢，決定離開，說道：「似這樣斷腸的地方，傷心國土，誰有那鐵石心腸，能夠再住片時半刻呢？」對遭受日本

40) 郭沫若作品中出現的「熟睡的白羊」，通常被比喻為冥頑不靈的舊社會中國，而「牧羊人」則是指手握重權、左右中國命運的統治者。

侵略者的殘酷逼迫而衰落敗壞的朝鮮慘狀，表現出哀歎之聲。以小說內容和表現手法來看，作者有意揭發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罪狀，並對朝鮮人民表達深切同情之意。就像「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峰的溪流，朝朝暮暮，帶著哀怨的聲音，被那日本海潮吞吸而去」，在描寫自然風光之時，筆帶哀愁，表達對朝鮮遭受日本併吞的惋惜情緒。主要人物閔崇華雖然毅然辭官落脚偏鄉，但他並未忘懷國家，藉著栽培子英和佩蕙，將希望寄託下一代，以圖謀未來，而且常叨念著說不久後就要帶他們去中國見識。從作者把他取名為「崇華」，並將他塑造成憂國志士形象，以及對在朝鮮所見所聞表現出無限慨嘆等內容來看，作者雖然是在處理殖民地朝鮮人民的處境，但心裡想的卻是內憂外患的中國。小說中安排了許多人物形象，如反對韓日合併的愛國人物、只知追求自身利益的小人、捨身營救主子的青年，以及處在歷史漩渦中失去親人的平民百姓等，這些人物情境可以對應到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許多國難，以及當時被日本強佔山東引起愛國熱潮的中國現況。進入現代階段，中韓兩國同樣遭到日本和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兩國在各自進行的抗日救國運動中產生了許多故事，兩國民眾都希望儘早從侵略者手中脫離苦海，並互相努力支持救國救民行動。懷抱著同樣目的東渡日本的郭沫若，途中目睹朝鮮慘狀，以其歷史經驗和反日情緒為題材創作出〈牧羊哀話〉，流露出他沉痛的悲憤心情。由此可見，朝鮮可以說是中國人反日情緒的投射對象，作者真正想要表達的應該是中國被西方列強瓜分的悲痛和山東案所引發的排日情緒，小說中造成尹子英死亡的閔崇華詩文，正代表著作者郭沫若的心聲。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陽心正驕。
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濤？安得魯陽戈，揮汝下山椒？
羿弓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洒山丘。
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標記為「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的上文〈怨日行〉，把日本的憲兵警察政治比喻為折磨萬物和人類的酷陽，如果有后羿和魯陽公的箭和劍，就有脫離苦

境的希望，但無從取得，只能徒呼負負，無奈悲傷度日。整首詩運用高度的象徵技巧，將經歷了十年殖民統治的朝鮮人心情，表現得淋漓盡致。這裡所採用的樂府詩「行」體例，比起溫雅、含蓄的古詩，形式上更為自由，且具有遒勁、顯露的文體特徵，披露忠臣及愛國志士的失落心情，也相當貼切。如此，郭沫若借用朝鮮故事來吐露中國人心聲的〈牧羊哀話〉，由張我軍轉載到民報上，並且強力推薦，肯定有其特定意圖。明白的說，應該就是想提供給同樣在殖民地處境的臺灣民衆，有個可以思索的對照物。可見以五四文學為媒介鼓吹民族意識和批判殖民現實的民報此一現代媒體，已經化身為同步思考中國－朝鮮－臺灣的東亞現代歷史的認識場，可以這麼說，1920年前後五四和臺灣知識階層共同期待新世界和新時代到來所企劃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在此展現出具體的成果。

了解當時東亞各地連動關係的不僅只有郭沫若一人，事實上五四知識分子普遍都對朝鮮情況相當了解。受到民族自決主義和一戰終結的影響，當時朝鮮和中國的知識階層相當受到鼓舞，不料，巴黎和會的結果一傳回中國，學生和知識階層相當憤慨，立刻進入全國性反日運動的準備階段。此時又傳來朝鮮三一獨立萬歲運動的消息，中國各媒體自然非常快速又大篇幅的加以報導，特別是《每週評論》、《晨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東方雜誌》、《新青年》、《新潮》等推動白話文的刊物，都發表了三一運動的相關評論。這些媒體紛紛表示，原本對威爾遜宣布「十四點和平原則」和民族自決主張持有不切實際幻想的朝鮮人，終於明白巴黎講和會議只是個欺騙人的把戲，才會引起如此爆發性的全民愛國運動。同時也不忘警告國人，日本併吞朝鮮後實施武斷統治，下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五四文人也對三一運動提出看法，陳獨秀運用讚美、哀傷、興奮、希望、慚愧等語彙，抒發他對朝鮮萬歲運動的感想；《每週評論》(1919.3.16.-3.23)和《新潮》(1919年4月號)也大幅刊出相關報導以及陳獨秀、傅斯年、陳兆疇等人的感懷和論評文章。例如《每週評論》報導〈朝鮮獨立的消息〉時，提到：「拿正義人道打破武力強權、所以不用武力、純以人民的資格運動、簡直可以說是在革命史中開一個新紀元」，並認為獨立

宣言書「特別注重人類平等的大義、民族自存的正權、想順著民族自決的潮流、積極發揮自由的精神」；⁴¹⁾傅斯年強調這是「非暴力的純學生運動」，期待中國人民也要早早覺醒；⁴²⁾陳獨秀非常重視「用民意，不用武力」的手段，對朝鮮民族的獨立自治充滿信心，並呼籲學生能夠覺醒起來；⁴³⁾陳兆疇認為「二十世紀為弱小民族、國家、階級從強大民族、國家、階級解放的趨勢明顯」，因而相信朝鮮的獨立早晚必會達成。⁴⁴⁾五四文人如此相繼表示悲憤情懷，並向大眾呼喊之後兩個月，由北京大學學生發起的五四運動果真擴散到全中國。郭沫若也應該清楚朝鮮三一運動的始末，因而藉著經由朝鮮的機會，寫出朝鮮人拒絕當亡國奴的故事。

不僅如此，五四所標榜的精神改造運動，同樣也逆向影響了朝鮮的知識階層。包括五四運動的理論主張在內，魯迅等人的五四文學也陸續在韓國大量翻譯出版。⁴⁵⁾〈牧羊哀話〉即由朝鮮文人梁建植(1889-1944)翻譯，於1932年改以〈金剛山哀話〉之名刊登在月刊《東方評論》，不僅引起朝鮮文壇的注意，也再度引發朝鮮人民痛感亡國的悲憤，促使愛國志士更加奮發圖強。如此，基於當時處境相同的基礎上，朝鮮和中國知識階層有了相互認識的機會，透過《臺灣民報》轉載五四文學，臺灣知識分子和民衆也得以認知到可相比擬的朝鮮處境，於此，民報儼然成為東亞現代歷史的認識場域。也就是說，五四文人以殖民地朝鮮為題材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小說，經由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機關誌民報轉載，提供給臺灣人民一個思考殖民地現實的機會。當時臺韓兩國即便同屬日本殖民地，但因檢閱制度的嚴格管控，朝鮮三一運動的消息並未見於臺灣媒體，⁴⁶⁾因此〈牧羊哀話〉的轉載，扮演起傳達朝鮮殖民地現實的媒介。當時

41) 〈朝鮮獨立的消息〉，《每週評論》第13期，1919.3.16。

42) 孟眞，〈朝鮮獨立運動之教訓〉。

43) 隻眼，〈朝鮮獨立運動之感想〉。

44) 穗庭，〈朝鮮獨立運動感言〉。

45) 有關此方面中文資料，參考謝佳軒，〈台韓魯迅接受史比較研究〉，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1。

46) 相關內容參考楊翎，〈台灣日治時期朝鮮意象的再現－以三種傳播媒介為分析對象〉，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12。

民報成員對官方屬性的《臺灣日日新報》新聞並不信賴，經常報導朝鮮相關消息，⁴⁷⁾因此，〈牧羊哀話〉得以轉載，也可從此脈絡中理解。事實上，1919年爆發的三一運動，也是始於愛國運動，而後逐漸轉換為廣泛的政治及文化運動，此與中國五四和臺灣新文化運動的性格一脈相通。隨著一戰的終結，在武力世紀轉換為文化世紀之際，臺灣－中國－韓國三地的知識階層，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樣採取思想改造和文化啟發的非暴力方式，進行抵抗，同時為改善民族處境，努力尋找妥適的政治運動，展現出東亞現代的歷史同時性。

四、臺灣「五四」文學發展的侷限及新文化運動的意義

1920年代，為順利推動新文化運動，也為同步成立臺灣現代文學，並在漢文使用以及現代化改革的要求環境下，引進了早一步啟動並進入實踐階段的中國白話文運動和五四文學。當中，白話文理論係直接移植，而救國和現實批判內容的五四文學，則是透過民報引進臺灣文壇，成為白話文學的對象，也成為現代文學內容主題的一種參照範本。此為臺灣和中國知識階層，在推動民眾啟蒙和政治要求的文化運動上，採取一致步調的緣由，可以說在「五四」磁場下，臺灣現代文學從出發階段就擔負起文化啟蒙和正視民族處境的時代課題。不過，在臺的文學實踐並不順利，主要是總督府實施的言論控制所致。民報系列報刊雜誌在1927年遷移到臺灣之前，一律在日本東京發行後，再寄到臺灣販賣，因此受到總督府警務局移輸入紙的規範，如果檢閱結果判定為違反出版品法，即會施以禁止銷售、扣押等行政處分。⁴⁸⁾《臺灣民報》的編輯後記上，常

47) 例如，〈朝鮮的政治〉(2:5)；〈白色聯盟〉(2:6)；〈京城帝大官制〉(2:8)；〈朝鮮的赤化運動〉(2:9)；〈全朝鮮記者大會〉(3:14)等。

48) 日據時期臺灣的言論政策，1898年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時初步立案，接著於1900年1月頒布第3號律令「臺灣新聞紙條例」，1917年又在此條文基礎上，頒布增訂有關從島外移輸入紙新規定的「臺灣新聞紙令」。其後整個殖民期間，總督府即根據此一法令規定，建構檢閱制度，嚴密控制臺灣的言論。有關日據時期臺灣的檢閱狀況，可參考河原功，〈日本統治期臺灣的檢閱情況〉，《殖民地檢閱》(首爾：昭明出版，2011)，頁623-688。

見抱怨檢閱制度或不滿的編輯心聲。創刊號就提到：「在東京本社發行的時，也受過內務省警視廳的檢閱，並沒甚麼可忌的地方，日本中華各地都是無事發出，獨獨到臺灣就這個樣子。足見總督政治的利害，實在可畏的很。」⁴⁹⁾；第1卷第4號：「本報自發三號以後因臺灣取次人之設置，未得督府的許可，故不得不停刊三期。」⁵⁰⁾；第1卷第5號：「本社發行7月分臺灣及7月15日分的民報被當局禁止，不知道甚麼原因，還未接到支局的信，諾同人在編輯局，調查內容約費三時間餘，不知那個地方是觸著馬頭呢？」⁵¹⁾；第1卷第7號也說：「本日電報云本報第六號在臺灣又被禁止，不知道那地方逆著大人呢，那樣平穩的記事還不能記的，教人怎樣寫法咧！據支局來信報說當局云全體皆不好了。」⁵²⁾像這樣，大部分情況都不知被禁的明確理由，報社也只能默默接受。在臺被禁的情形頻頻發生，該刊乃在第1卷第10號〈時事短評〉提出較為強烈的批判：「近來臺灣的言論界，發賣禁止頻頻，台政新報、台灣、台灣民報、台南新報，或被禁止、或被削除，作出奇奇怪怪的禁止法，言論是民衆的論壇，代表民意，若非朝憲紊亂，破壞公安的記事，雖是批評當局的施政不好，這也是要使當局猛省，速爲改善的緣故了。執檢閱權的人，須十分理解，不可固執專制時代的古法，若不利當路便就禁止，壅塞民意，遂使官民不能接近，互相隔絕，這是不合現代民衆政治的主旨了，凡愈文明的國，言論愈尊重自由，僅有半開的國最爲不自由，最受壓迫，如此皆是阻害國家社會的發達了，願當局亦要斟酌些兒，不可以感情的取扱是最希望的。」⁵³⁾總之，從1923年4月到1924年12月間發行的共14號民報中，在臺灣順利銷售的只有11號而已。⁵⁴⁾這種情形直到第二年仍然不見改善，民報於是在第2卷第19號(1924.10.1.)撰寫社論〈希望改正新聞紙令〉，指責言論機關不可專爲內地所獨占，要求目前的許可主義應改爲與

49)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創刊號，1923.4.15，頁30。

50)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4，1923.7.15，頁79。

51)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5，1923.8.1，頁16。

52) 〈編輯餘話〉，《臺灣民報》1：7，1923.9.1，頁16。

53) 1923.11.11，頁5。

54) 以後的情形也差不多，21號同樣在臺被禁，另外19、22、27號的「社說」也遭到禁刊。

內地一樣的屈出主義(申報制)。⁵⁵⁾

檢閱制度的存在,一方面直接限制了殖民地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由於被禁造成龐大的財政損失,因此無論報社成員抑或寄稿人都會小心翼翼,要求自我約束和預先檢閱,特別是如果不知被禁的理由為何時,編輯者更會審慎地刪除敏感內容,如此很自然即達到言論控制的目的。民報面對如此嚴苛的檢閱,通常會將被禁的重要文章再登於下一號,以尋求補救措施,但即便如此,就言論自由與效果而言,無疑是產生了相當的侷限。

本文中討論的兩篇小說同樣也都遭遇到檢閱的限制。〈臺娘悲史〉所刊第2卷第2號受到在臺禁止販賣的處分:「本報二卷二號因為〈對於教育界的不滿意〉和〈臺娘痛史〉兩題觸著檢閱大人的意,遂被禁止在臺發賣了,所以不能發送於在臺的讀者,請原諒就是了。」⁵⁶⁾〈臺娘悲史〉的刊登成了問題,小說雖以迂迴批判方式呈現,但日猛形象以及臺娘成了小妾之後的一些描寫,可能抵觸出版法而無法見容於憲警機關。知道自己小說成為民報被禁的原因之後,施文杞以淚子的筆名寫了〈是我的罪〉:「我那篇小說,不過也是一篇普通遊戲的文章,實沒什麼價值。…不想竟出我意料之外,把一篇沒有價值的文章,而變做幾百元值得的文章。…因為民報被禁止一號,我想大概要數百元的損失。…哇!臺灣的同胞們呀!臺灣親愛的同胞們呀!你們要喊口無言嗎?那麼,我從此以後,也要喊口無言了。我這回直接防害著民報社數百元的損失,間接防害著讀者的眼欲,這都是我的罪,我自己應該承認起來,惟有望讀者諸君原諒原諒罷了!」⁵⁷⁾其後民報上再也看不到他的小說了,施文杞只能發表一些評論或與世界情勢有關的文章而已,⁵⁸⁾可見檢閱制度確實造成寄稿人的心理負擔,也削弱了

55) 1927年3月6日發行的第147號〈餘錄〉仍然有此紀錄:「正月以來,本報在臺灣禁止而被截取的部分,第139號時事欄〈孫科等在漢口大呼打倒英國〉。第140號評論欄〈此後的對華政策如何〉及〈革命軍與臺灣的影響〉。第141號論壇欄〈產業政策與臺民的覺悟〉。第143號時事欄〈大甲農民組合員的奮鬥〉及餘錄欄大肚農民的記事等處,總望讀者各位諒察就是。」

56) 〈編輯後記〉,《臺灣民報》2:4,1924.3.11,頁16。〈臺娘痛史〉為〈臺娘悲史〉的誤記。

57) 2:6(1924.4.11),頁13-14。

58) 如〈斐律濱三十年來之趨勢〉(2:1);〈我讀民報時事短評欄的「女子興漢學的先聲」的一段後〉(2:2);〈哀威爾遜的死〉(2:4)等文章。

他們的創作意志。

〈牧羊哀話〉的情況則有所不同。民報從第76號(1925.10.25.)到78號(1925.11.08.)連載該篇小說，不過民報所刊內容與前節所述原作內容，並不完全一致。原本小說共由六個小節組成，但是民報上卻看不到四、五小節，原第六小節被標示為第五小節。象徵朝鮮未來的尹子英被親爹所殺、教唆子英父親尹石虎的李氏自殺的情節內容，都一一遭到刪除，而這章節正是小說中最為核心部分，當中還包含忠臣閔崇華的反日詩文。因此，即便臺灣讀者透過民報接觸到該篇小說，但卻無法全面把握故事的來龍去脈。雖然不清楚什麼原因造成漏刊，不過從民報常以內容不當為由遭禁的情況來看，多少可以推測小說的反日內容變成了問題，也或許因為如此，張我軍乃在附記中特別推薦此作，希望臺灣讀者多加關注。

從以上兩篇小說的刊載情形來看，顯然五四磁場下的白話文文學，要在殖民地臺灣推動並不容易。進入1930年代後，白話文文學再度面臨重大挑戰，它常被指說，作為文學語言並不適切，理由是它與臺灣民衆的語言有明顯程度的隔閡。⁵⁹⁾臺灣話文論爭中強力主張使用臺灣話文的郭秋生(1904-1980)提到，白話文的淺白雖然接近臺灣語體，但以言文一致的原則來看，白話文不足以說明臺灣特有的言詞，白話文的組織發音都不與臺灣語一致。況且日本帝國主義又強迫殖民地住民捨棄母語，改使用帝國的語言文字，來去勢原住民的固有精神和族姓，讓他們萬年順從。⁶⁰⁾郭秋生認為白話文無法完全表達臺灣話，同時為對抗日本的同化政策，乃積極主張採用臺灣話文。由此，一些文人持續為落實臺灣話文能夠作為文學語言，想方設法做出各種努力，例如《南音》(1932)雜誌討論臺灣話文的標記問題，⁶¹⁾為了確立臺灣話文的標記方法，蒐集各地的民間歌謠，還引起了民間文學採集和整理的熱潮。⁶²⁾

59) 此與1930年代社會主義思潮的引入以及左翼文壇的成立有其一定的關係，特別是在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上，無產大眾成為文學主體已為人所重視，他們所使用的語言當然也會受到注意。

60) 〈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上)〉，《臺灣新民報》379號，1931.8.29。

61) 例如，設置「臺灣話文討論欄」、「臺灣話文雜駁」、「臺灣話文新字問題」等欄位中進行相關討論。

白話文作為文學語言，前後不到十年時間經歷如此的演變，主要是為因應日本的同化政策，也因文化運動產生質變－文學主體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移到勞苦大眾。1920年代提倡採用白話文，本是期待以平易的實用文來達成文化普及功效，也為鼓吹民族意識，但是1925年發生二林事件之後，知識階層左右分裂，由他們所推動的文化運動也從啟蒙質變到追求解放，因而民衆的生活語言開始受到重視。從此白話文乃被認為係知識階層所專用，與廣泛臺灣大眾乖離，其作為現代文學的語言功能，也就受到質疑。在如此演變的環境之下，五四磁場下白話文文學的在臺發展，自然或多或少受到侷限。即便話文論爭結束之後，因臺灣話文的文字化和讀者的接受不易等原因，作家大都採取敘述上用白話文、人物對話上用臺灣話文的方式，但1920年代初五四磁場下誕生的臺灣白話文文學的發展，可以說並不順利。⁶³⁾

總之，以政治運動來評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可以說並未達成所預期的目標。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終究還是失敗，中國領土的分割也持續在進行，其主權也受到傷害。五四和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所認知及期待的人類新紀元和正義、和平、文化的世紀，也並未到來。一戰結束後召開的巴黎和會，其實充其量不過是勝戰國利益導向的妥協會議，其結果日本在東亞的權益進一步獲得擴張。一戰後世界的中心雖從英國轉移到美國，但卻仍然無法改變帝國主義列強分割支配全球的趨勢。即便如此，以文化運動來評估兩地知識分子所做的努力，那就可以說它已達到所預期的目標。畢竟截至目前，五四運動依然普遍被認為是中國現代真正的起點；而日據五十年期間當中，1920年代可以說是最積極推動現代化改革、確立民族意識和建立自主的現代文學時期。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共同兼顧的思想改造和民族處境的改善，同樣兼具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性格，兩地知識階層所推動的現代企劃和民族實踐，不但符合當時民衆和時代的要求，也呈現出二十世紀東亞現代的共同面貌。

62) 1936年發行的《臺灣民間文學集》為其具體結果。

63) 日據末戰爭時期漢文雜誌《風月報》系列，也並不完全採用白話文。

參考文獻

- 《臺灣青年》，東京：新民會，1920年7月16日創刊
- 《臺灣》，東京：新民會；臺灣雜誌社，1922年4月1日創刊
- 《臺灣民報》，東京：臺灣雜誌社，1923年4月15日創刊
- 《臺灣風物》，臺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51年12月1日創刊
- 《新青年》，上海：群益書社，1915年9月15日創刊
- 《每週評論》，北京：北京大學，1918年12月22日創刊
- 《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82
- 가와하라 이사오, 「일본통치기 대만의 '검열'실태」, 『식민지 검열』, 서울: 소명출판, 2011.
- 郭沫若, 《創造十年》, 上海: 現代書局, 1932
- 司馬長風, 《中國新文學史》, 臺北: 古楓出版社, 1986
- 埃雷斯·馬內拉(Erez Manela), 《1919—中國、印度、埃及和韓國, 威爾遜主義及民族自決的起點》(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 香港: 八旗, 2018
- 吳文星, 〈日據時期臺灣中華會館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臺灣史研究暨史蹟維護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 臺南市政府, 1990
- 尹雪曼, 《中國新文學史論》, 臺北: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 1983
- 張德旺、謝治東, 〈朝鮮三一運動對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卷第4期, 2000.12
- 陳芳明, 《臺灣新文學史》, 臺北: 聯經出版社, 2011
- 陳三井, 《國民革命與臺灣》, 臺北: 近代中國出版社, 1980
- 崔末順, 〈新文學的啟蒙內容及其結構: 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中的文學論比較〉, 《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研究》, 慈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 2017
- 崔龍水, 〈朝鮮3·1運動과 中國5·4運動의 比較-中國史料를 中心으로 하여-〉, 《國史館論叢》第49輯, 1993.12, 157-223면

- 謝佳軒, 〈台韓魯迅接受史比較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2019.1
楊翎, 〈台灣日治時期朝鮮意象的再現－以三種傳播媒介為分析對象〉,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4.12

Abstract

May Fourth, New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Korea –Discussion on modern East Asian based on two novels in Taiwan People News

Choi, Mal-soon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ates the era when the separately developed New Culture movement and May Fourth movement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met around the 1920s, and then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recogni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in the two places, and the propagation of May Fourth movement toward Taiwan, based on two novels published in Taiwan People News. There are three main objects in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ing about how the intellectual clas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fused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ew Culture movement with their political demand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ccording to their view of vari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rends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 Second: in the epoch of Taiwan People News, New literature was a part of New Culture movement. Because of the revival of sinology and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reformation, abundant literature in vernacular language was imported. Also, that vernacular literatur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by their themes and content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knowledge, this paper selected two novels -- Grief history of Taiwanese women, Sorrowful story of a shepherd – from author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topics focused by New literature and May Fourth movement. Moreover,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mmon recogni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at era, while Korea was serving as a medium in those topics. Then,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early intellectual class built their understanding field of modern East Asia based on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China, Korea and Taiwan. Third: Due to the influence by May Fourth movement,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was limited. For example, the strict article review system and the colonial background both restrained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from efficient propagation and promotion.

Despite that, the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al demand of intellectual clas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round the 1920s still fitted the expectation of people in that era, and also reflected the common features of modern East Asia in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May fourth movement, *Taiwan People News*, *Grief history of Taiwanese women*, *Sorrowful story of a shepherd*

투 고 일 : 2020. 7. 10. / 심 사 일 : 2020. 7. 15. ~ 2020.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0. 8. 20.